

青年视点·沈杏培主持

鲁迅杂文与左翼文学时代的来临

殷鹏飞

摘要：从参与“大革命”到加入“左联”，鲁迅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通过翻译与阅读不断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最终确立以文学投身革命的信念，其杂文写作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展开。20世纪30年代杂文与杂感的分野、杂文文体的确立背后是鲁迅思想意识的转变，无产阶级意识的凸显。较之于杂感，杂文不论斗争方式，还是载体都发生了变化，逐渐由此前知识分子写作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文化斗争。从创制到成熟，鲁迅杂文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如影随形，询唤了一代青年投身革命。

关键词：鲁迅；杂文；文体；革命

1936年10月17日，鲁迅在最后的文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提到了章太炎对《馥书》的修改：“但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解辩发》）文见于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馥书》中，后经更定，改名《检论》时，也被删掉了。”^①刘宁曾指出，以“书”命名的著作保留着中古子书对社会问题发表广泛意见的特点，将《馥书》中的“书”易之以“论”，无疑淡化了其与中国子学论著精神气脉上的联系。^②由书到论，文体的改变所对应的是章太炎从“有学问的革命家”退居为“宁静的学者”，日趋保守的过程。在生命最后时光中，鲁迅对太炎先生早年战斗文章的回忆与发扬，在某种程度上也投射了对他自己战斗的文体——杂文的坚持与肯定。

1926年编订《坟》时，鲁迅首次使用“杂

文”的命名，将“杂文”与此前的“杂感”相并列，以示区别：“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而名之曰《坟》……”^③但在1932年4月24日编订《三闲集》时，鲁迅并没有重启“杂文”这一名目，而是在《序言》中将《三闲集》中的篇目称之为“杂感”^④。仅仅一周后，4月30日编订《二心集》时，鲁迅则明确地将其定为“杂文集”：“这里是

①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78-5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② 参见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第14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③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8-299页。

④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页。

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①此后,鲁迅对自己文集的命名经历了一个“杂感淡出,杂文凸显”的过程,经过1934—1935年的“杂文论争”,鲁迅对“杂文”这一名目的使用逐渐稳定下来。由杂感到杂文,名目的使用、变化与重启只是问题的表面,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鲁迅杂文之发生,或许更多不在其‘文体’的创生,而在某种思想的创生”^②。名目背后蕴含着鲁迅在左翼文学时代来临之际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新思考。

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意识到鲁迅杂文经验背后文学、政治之间如影随形的关系,试图用杂文经验去投射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构造,陆续提出的“杂文的自觉”^③“行动的文学”^④“文学政治”^⑤等概念,打破既往研究中已被视为规范的“文学”“政治”的定义域,相关研究从鲁迅的杂文经验中发掘出中国革命的普遍性意义,也摆脱了此前在鲁迅自己的表述内部分析杂文形式的局限。但鲁迅对“杂文”创制的思想过程究竟为何,学界尚未进行过更为细致、历史的考察,本文从“大革命”到“左翼文学时代”来临之间鲁迅的阅读、翻译、演讲入手,通过分析鲁迅的现实境遇、思想意识的变动与杂文文体创制之间的关联性,呈现出文学形式与政治意识之间的互动历史过程,揭示出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经验的鲁迅杂文的价值与意义。

一、文体问题：变局中的文学与政治

1925年12月,鲁迅应《国民新报》主编邓飞黄之邀,担任国民党左派机关报《国民新报副刊》的主编,而当时的《国民新报》恰由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资助,可视为国民党在北京的喉舌,邓飞黄回忆:“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因为北京没有党的机关报,就接济我们的经济,并增刊英文版,由一位美国的女共产党员主持,林玉堂也负一部分责任。党中推定李大钊、顾孟余负责指导,并组织社论委员会,中文副刊由鲁迅主编。”^⑥这足见鲁迅已进入了国民党左派在北京的宣传组织中。然而,位于革命前沿的鲁迅却并未在自己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种)上鼓噪青年进行革命行动,而是以相当的

篇幅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1925年12月鲁迅主持的《国民新报副刊》(乙种),以刊登小说、诗歌、杂感为主,涉及文体问题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家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的《文体问题》,另一篇是小泉八云的《文艺与政治的意见》,这两篇文章均由鲁迅北大时期的学生赵荫棠翻译,赵荫棠曾听鲁迅讲授过《苦闷的象征》,此后也与鲁迅有书信往来。赵荫棠将自己翻译的两篇文论交由鲁迅,很快在《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这两篇文论显然切中了鲁迅的关切。

从时间上看,鲁迅在《国民新报副刊》上刊登这两篇文论并非偶然,尤其是对文学与政治问题的关注有着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1924年,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时,漏掉了厨川的一篇访谈《文学者与政治家》,并在后记中加以说明;1926年初,编译了小泉八云《文学与政治问题》;1927年3月,在黄埔军校做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1927年底,翻译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时,遗漏了《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一文;几乎是在同时,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做了同题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可见,不论是身处“首都革命”渐入高潮的北京,还是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抑或在革命落潮后的上海,近三年的时光中,鲁迅对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论述核心的文本进行了集中阅读。这背后隐含着的是鲁迅在政治变局中对文学位置的思虑。颇有意味的是,鲁迅对厨川白村、鹤见祐辅两篇文论有意遗漏的同时,却编译了小泉八云《文学与政治的问题》,并在此后发表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文本的显与隐所牵连的是鲁迅对于文学在革命时代

① 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93页。

②④ 周展安:《行动的文学:以鲁迅杂文为坐标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

③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上、下),《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2期。

⑤ 邱焕星:《“文学政治的世纪”:关于“鲁迅文学”命题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6期。

⑥ 邓飞黄:《邓飞黄自传》,第27—28页,长沙:岳麓书社,2012。

的期待视野。

鲁迅所遗漏的《文学者与政治家》《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两篇文意相类,都是以莫雷(John Morle)、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布莱特(John Bright)等英法政治领袖作为政治与文学相互融合的典范,反思日本政治家缺乏思想内涵,只是将文学作为游戏的局限:

特别是在现代这样将文学作为我们现实生活基石而存在的时代中,文学家和政治家之间却产生了完全没有交流的现象,这显然表明了日本人思想生活中的某种缺陷。^①

今天的日本,社会拥挤不堪,身居高位的人并没有一个能够施展文学才华的环境。未来,随着世界局势的缓和,政治与文学将会合流……如果一个政治家碰巧进入了文学世界,那也只能是吟诵一些庸俗的诗歌、和歌和俳句,并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人文主义者。^②

鲁迅之所以选择不译这两篇文论,恐怕与他对文学在革命时代的功用的认识有关。此前,在翻译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时,鲁迅认为厨川的观点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而没有翻译《文学者与政治家》这篇访谈,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如此解释自己的漏译:

文学和政治都是根据于民众的深邃严肃的内底生活的活动,所以文学者总该踏在实生活的地盘上,为政者总该深解文艺,和文学者接近。我以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③

所以,此后在翻译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时,他忽略文意与之相近的《文学与政治

的歧途》也就顺理成章了。与厨川和鹤见寄望于“文学与政治将会合流”^④不同,对北洋政府“丑态和恶行”极度厌恶的鲁迅,所期待的不是自上而下的文学启蒙,而是深植于民众思想、情感的文学表达。1926年12月,鲁迅编译的小泉八云《文艺与政治问题》一文,话题同样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小泉与厨川、鹤见对于“文学”“政治”的着眼点截然不同:小泉并不以欧美政治家的行述作为参照,而是一开始就将“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道出,“首先要请你们想一想在国家政治上公众意见的意义”^⑤。所以,小泉所说的“文学”就是表现民众“那想象与感情的文艺。能读纯粹哲学与科学的书籍的,不过有数千人;而能读那动心的小说与诗的,乃有亿万人”^⑥。小泉以俄国文学在欧洲的影响为例来论说文艺对于政治上相互理解的重要性:“政治上的俄国仍然是欧洲的梦魇。但其人民何如,已由它的文艺之中被欧洲所深深的了解了。素常对于俄国的讨厌与仇恨,已换为人类同情与慈爱的一般感情了。”^⑦虽然小泉的整体价值取向和厨川、鹤见相似,沿着“脱亚入欧”逻辑展开,但是具体着眼却不再局限于欧美个别政治家的行述,而是将文学置于近代大众政治兴起的背景下进行论说,由此推出文学所牵连的情感问题,不论是在国家政治内部,还是在国家交往、竞争之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国家的感情实在可以说议决种种的问题”^⑧“造成公众意见者大半是感情上的事,不是思想上的事。国家的感情不能由头脑上得到,必须从心田上得到……唯有一个小说家,唯有一个诗人,很可以作这个”^⑨。对上述论题相近的三篇文论,译与不译之间的选择隐含着的是鲁迅对文学在

① 厨川辰夫:「文學者と政治家」,『象牙の塔を出て』,195-196頁,福永書店,1920。

②④ 鹤见祐辅:「文學と政治との歧路」,『思想・山水・人物』,247頁,大日本雄辯會,1929。

③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卷,第266页。

⑤⑥⑦⑧ [日]小泉八云著,荫棠译:《文艺与政治的意见》,《国民新报副刊》第46号,1926年1月23日。

⑨ [日]小泉八云著,荫棠译:《文艺与政治的问题(续前)》,《国民新报副刊》第56号,1926年2月2日。

时代变局中位置的判断:在大众政治兴起的时代,文学不是政治家施行教化的工具,而是连接民众之间情感、消除隔膜的媒介。所以,在《革命时代的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都始终坚持文学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联,“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况,觉得不平,觉得痛苦”^①“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②。译与不译所反映的是鲁迅以向下的眼光定位文学在革命时代的位置。

处在革命年代,鲁迅对于文学、文学者的理解显示出与厨川、鹤见、小泉不同的特质。三位日本文学家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都是以一种外部化的眼光看待政治,正如柄谷行人对于日本近代文学起源的追溯:个体的内面与国家政治在表面上的相互背离,实则是日本近代国家制度稳固下来的表现。^③而鲁迅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分析,则是在如影随形、相互转换的关系中展开的,文学不为外在的政治所决定,而是重构新政治的大经大法。所以,1927年底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尽管论题与鹤见祐辅《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一文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但在开篇鲁迅就强调:“我每每觉到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与革命原不是相反,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④“文学”呈现出一种流动的、不断转化的状态,不仅催动社会革命,同时还警惕着革命成功的第二天可能出现的堕落,“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⑤。在鲁迅看来,革命时代的文学家从未入地相宜,而是处处格格不入,文学不仅在是与政治对抗中,成为革命的先声,也在同革命的对立中,警惕着革命的堕落,重塑了革命的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者也就成为永远的革命者。

那么,革命时代的文学家又如何寻求文质相合的表达形式呢?1926年1月,《国民新报副刊》编译的另外一篇文论《文体问题》,在某

种程度上投射了鲁迅在文体方面进行探索的兴趣。文章的核心意在说明作家要去努力寻求文体(Style)与内容(Matter)的同一性,“说明文体与文质如何的共存,不能分离,且一样……你不能把文艺分为两种要素而且说:这是文质,那是文体”^⑥。同年9月,到厦门以后,鲁迅在编订《坟》时,第一次使用“杂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命名:“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⑦这里将“杂文”与“小说杂感”并列,可见鲁迅对“杂文”的定位与此前的“杂感”相区隔;1927年,在广州“清党”的恐怖氛围中,鲁迅在编订《朝花夕拾》时再度提及了文体的问题:“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⑧杂文与杂感的分别在何处,鲁迅并未言明,但他对“杂文”这一新文体的探索可以说是在革命的一波三折中逐渐开启了,尽管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再度重启“杂文”这一名目,但他对于杂文所关联的文学与政治问题的探索却不曾易改。“大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变使这一时期的鲁迅处在流离、动荡的状态中,但鲁迅念兹在兹的还是文学者在时代变局中的位置以及新的表达形式的创制。

二、文体的重启:杂文与左翼文学时代

1932年4月在编辑《三闲集》《二心集》时,鲁迅分别用“杂感”^⑨“杂文”^⑩命名两篇文集里的文章,这是他在编订《坟》后首次启用“杂文”这一名目,他对两本文集不同性质的定位

①②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38、441页。

③ 参见[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岩波定本),第87-8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④⑤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15、121页。

⑥ [英]Arnold Bennet著,荫棠译:《文体问题》,《国民新报副刊》第32号,1926年1月9日。

⑦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8页。

⑧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36页。

⑨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页。

⑩ 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93页。

背后是对自身经验的重新阐释,而《三闲集》和《二心集》分别对应的恰是加入“左联”前后的时间阶段。对鲁迅而言,文学、政治、革命不仅是身外的时代浪潮,同时也是内在价值的秩序。所以,鲁迅杂文对应的与其说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左翼文学,毋宁说是鲁迅在“大革命”中萌发由文学介入政治的信念,终于在“左联”成立的契机下得以再次开启。虽然经历了“大革命”的震荡,但鲁迅并没有放弃文学的介入性,转而以社会科学的眼光去看待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的位置,纠正了他此前“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①。

1927年10月抵达上海后,在11月至12月间,鲁迅写作了《文学和出汗》《文艺和革命》,做了《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翻译了青野季吉《关于知识阶级》、有岛武郎《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可见,这一时期鲁迅对文学和政治、知识人在时代中的位置进行了非常集中的思考,与此同时,“清党”后一系列政治变动也波及了他的生活。1927年10月19日,鲁迅刚到上海半个月,中共已经透过济难会与他进行了接触。济难会的组织部长王望平为济难会办刊的事宜,曾邀请鲁迅、郁达夫、王映霞、楼适夷、许杰、潘汉年等十一人到兴华酒楼,鲁迅日记对此曾有记述:“晚王望平招饮于兴华酒楼,同席十一人。”^②中共最初是透过外围组织中国济难会(又称“互济会”)与鲁迅接触的。中国济难会北平分会曾是国民党左派在北方的重要外围组织,国民党左派中的不少要员也在其中任职,^③其中不少也与鲁迅和许广平相熟。济难会在国民党“清党”后转入地下,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下属的外围政治组织。江苏省委关于济难会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济难会目前的工作是“深入到社会各层,特别是容易同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征[争]取济难会的朋友或同志,以扩大济难会的物质基础或社会地位”,在宣传方法上则要求“须以灰色而充实能普及社会”。^④1928年初到达上海的杨度正是在济难会的逐渐发展下,成为中共的秘密党员,根据夏衍的回忆:“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潘汉年同志介绍,他申请入党,

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⑤作为国民党左派曾经在北方的宣传骨干,鲁迅对互济会“招饮”“募捐”背后的政治意图不会陌生。虽然“上海党通过互济会与鲁迅有关系,互济会方面有人几次去找鲁迅谈话,鲁迅捐过款给互济会”^⑥,但1930年之前,鲁迅不仅公开言论从未涉及过“互济会”,甚至日记中都不曾留下记录,直到1930年加入“左联”后,鲁迅才在日记中留下与互济会之间银钱收付的记录:“七日(1930年6月7日,笔者注)晴。午后雪峰、柔石来。捐互济会泉百。”^⑦可见,这一阶段的中共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团结鲁迅,对文学家、文化工作都较为忽视,郑超麟曾回忆:“我是如此不习惯于同党外的人办交涉,尤其同文学家办交涉。”^⑧

几乎是在互济会与鲁迅进行接触的同时,国民党左派也意识到鲁迅的能量。1927年11月,与鲁迅在“首都革命”中结下友情的易培基邀他前去劳动大学兼课,从11月至次年2月双

①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6页。

② 鲁迅:《日记十六[一九二七年]》,《鲁迅全集》第十六卷,第42页。

③ “民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正式开成立大会,选举干事九人组织干事会,被选举者为:王一飞 刘清扬 夏秀峰 丁振华 魏建功 李骏 李人祝 郭春涛 刘尊一,并由干事会推魏建功、李骏、夏秀峰等分任组织、宣传、会计各部,同时又推选董事十六人组织董事会,被选者如下:徐谦 于右任 王法勤 丁维汾 顾孟余 路友于 邵飘萍 潘蕴巢 陈启修 萧子升 李石曾 冯永垣 雷殷 管翼贤 徐风人 郭春涛。”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调查科特务组:《共党互济会之调查(1931年)》,《展望与探索》2010年第9期。

④ 《华字通告第48(转录中央通告第42号——关于济难会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肖辅玢、许光顺编著:《中国济难会革命互济会在上海》,第104-107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

⑤ 夏衍:《杨度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78年9月6日。

⑥ 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资料》,《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24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⑦ 鲁迅:《日记十九[一九三〇年]》,《鲁迅全集》第十六卷,第199页。

⑧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第287页,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

方书信来往频繁;12月,改组派背景的《贡献》创刊后,主编孙福熙亲自送到鲁迅的府上,“收春台所赠《贡献》一束”^①。但是,鲁迅应邀在劳动大学讲两次课后,不仅表示不会再去兼课且退回了全部薪水,此后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对成为“改组派”喉舌的《贡献》也颇有微词。比照对互济会和国民党左派的态度,鲁迅的政治倾向性显而易见。但是,鲁迅所期待的仍是经由文学介入政治,而非直接参与政治活动。虽然各种力量与之频繁接触、示好,但鲁迅却无任何欣喜,“在此亦静不下,毫无成绩,真不知如何是好”^②。

与对参加政党活动的意兴阑珊相反,1927年9月在从广州赴上海启程前夕,鲁迅给李霁野的信中就透露出自己到上海后预备联合创造社,在文艺方面用力的意图:“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沈钟三社。”^③因此,当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前来商谈联合事宜时,双方一拍即合。12月3日,《时事新报》刊出《创造周报》的复刊广告,鲁迅位列特约撰稿人的第一名,这是鲁迅在1927年10月到上海后首次公开表示加入某一团体之中。而当月出版的《创造月刊》刊载的《创造周报》的“复活预告”如此表述文艺与时代变局之间的关系:“时辰滚滚地流去,转瞬之间,在我们的文艺界瞌睡着的当中,时代又已经前进得离我们很远了。文艺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头,至少也得跟在时代的尾后前进。”^④根据郑伯奇多年后的口述“联合宣言,鲁迅、郭老都签了名”^⑤,虽然不能判断这份预告就是郑伯奇所说的“联合宣言”,此后发生的“革命文学”论战也打断了双方联合的计划,但这份“复活预告”中由文艺介入时代政治的设想,却与鲁迅此前的思路不谋而合。

此后,鲁迅虽然短暂参与“自由运动”,但很快淡出,唯对参与“左联”相当坚持,以致最后因“左联”的解散引发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而“左联”的成立,不仅意味着一个属于左翼文学时代的来临,也使得鲁迅从文学出发介入政治的努力有了组织的依托。正是鲁迅对“左联”的参与,使得左翼文学具有了超越组织属性的思想内涵,毛泽东曾如此形容组织破坏殆尽时

左翼文学的超越性和鲁迅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⑥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指出由于城市革命的挫折,“自革命失败以来,党与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逐渐隔阂……在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中的关系亦几至绝缘”^⑦,因此,亟须在组织上重建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联系,“故目前党的组织任务,对于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不仅应加入活动,而且应创造这些组织,以领导广大贫民群众尤其是学生走向革命方面”^⑧。而文艺无疑是连结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重要媒介,其不仅吸收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入党,还可以“利用同学主编公开刊物,联络社会上左倾的文化团体……努力扩大或增加各种文化刊物,及一般文化事业,本校指导之下,力求其工作能公开社会及深入群众”^⑨。同时,中央“文委”负责人潘汉年、上海法南区书记李富春亲自出面调停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的争论。在城市革命不断受挫的背景下,中共透过文学进行革命宣导,推动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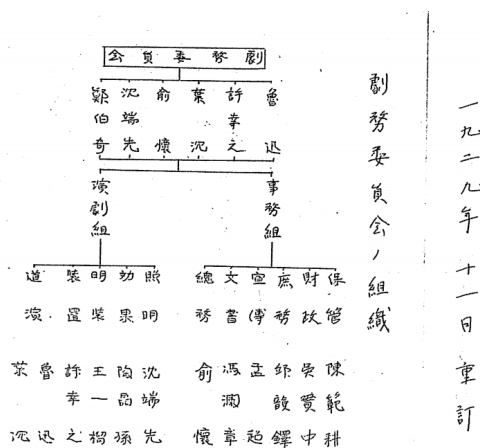
-
- ① 鲁迅:《日记十六[一九二七年]》,《鲁迅全集》第十六卷,第50页。
 - ② 鲁迅:《271116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88-89页。
 - ③ 鲁迅:《270925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76页。
 - ④ 《〈创造周报〉复活了》,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上),第421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⑤ 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的一些情况》,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6辑,第10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 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⑦⑧ 《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中全会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41-242、24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 ⑨ 《上海文化工作者第一次支部报告》,《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第15页,中央档案馆 江苏省档案馆,1988。

变革的努力,与鲁迅此前对文艺革命性位置的设想不谋而合。

1930年4月,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领事重光葵拍给时任外务省大臣的币原喜重郎的电报中,提及了1929年11月艺术剧社成立以来,鲁迅和创造社透过文学活动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践:

最近,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昭和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参照机密三七五号)以干部郑伯奇、沈端先、鲁迅等创造社系(共产党系)的人物为中心组织艺术剧社,今年春天以来在上海各个剧场、纪念式会场等利用各种演题巧妙地鼓吹共产主义。(3月1日朝鲜独立纪念日确实有演出)针对2月5日法租界贝勒路祥昌纱厂事件……^①

在重光葵的这份报告中,鲁迅不仅位列创造社的成员,甚至还位列剧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如下图):



重光葵报告附图

这份情报大概率将导演“鲁史”误作“鲁迅”,系误植,但对理解鲁迅介入左翼文化运动的时间和态度仍有重要的佐证作用。至少,在日本情报部门这样的文学门外汉看来,1929年冬天鲁迅与创造社联合,从文学出发介入政治的行动,与鲁迅此前所呈现的公共形象之间没有丝毫的违和感。所以,鲁迅加入“左联”,与其说是转向,毋宁说是对此前所树立的文学理念

的忠诚。1932年,鲁迅以1930年为界将自己1928—1931年的文章分为“杂感”与“杂文”,分段背后既是公开表明自己的“左倾”立场,斩断旧我,相信“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②,同时也是对此前变局中所确立的文学理念的回眸,是对革命时代之中文学介入性的坚持。

三、文体的转换：形式与阶级意识

一直以来,鲁迅都是在“文学”与“革命”的同一性当中理解“文”的诞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③1932年,鲁迅在编订《二心集》时虽然重启了《坟》当中“杂文”的名目,但同时又将《坟》定义为“论文集”以示区分:“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④此后,虽间或使用“杂感”来定位《伪自由书》,但经过1934—1935年与林希隽等人的“杂文论争”,他对“杂文”的使用逐渐固定下来。由“论文”“短评”“杂感”到“杂文”的变化,显示了鲁迅逐步清晰的杂文意识。由感而文,文体名目的变化究竟隐含了何种不同的意识呢?

瞿秋白曾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将鲁迅“杂感”视为“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⑤,何谓“阜利通”?“Feuilleton”是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期言论管制下的产物,由于政治的高压,当时的学者无法在专栏发表政论,但是却可以在“报屁股”(Rez-de-Chaussee, the Ground Floor of Journal)的位置进行写作,以躲避审查,虽然内容只是针对一些文学、戏剧或其他无关政治的

① “Miscellaneous Documents Relating to Communist Propaganda / Propaganda towards Japan, Vol. 3.”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Diplomatic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rchive identifier A-3-4-0-2_4_003, date range 4 April 1930 to 12 May 1930, JACAR,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 Ref. B02030938800.

②④ 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95页。

③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92页。

⑤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第三卷,第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话题,却可由此在管制下获得文化政治资本。^①在报刊体系下,“阜利通”也就与“由无休止的文节长句组成的复杂文章——一种综合性的文体”发生了碰撞,“取而代之的是采用简洁的疑问句、尖锐的短句、用连接词分隔句节的文体”。^②作为资深的新闻记者,瞿秋白的“阜利通”比喻把握住了鲁迅杂感文体的思想内核。鲁迅杂感最初源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栏目,《随感录》顾名思义随感随录,偏重评论。陈独秀、鲁迅写作的“随感录”风格各异,陈独秀的随感录多涉政论,鲁迅曾赞“独秀随感究竟爽快”^③,但鲁迅的“随感录”却与陈独秀的经国政论异趣,自言“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④,而此后杂感的内容也沿此风格,不仅对中国发生的大事件“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⑤可见,鲁迅杂感与“阜利通”类似,在后撤的空间中获得了介入政治的契机,生成了文化政治。王凡西在回忆录中就曾提及自己阅读鲁迅杂感时的感受:

牵涉的竟往往是些“私事”。但它们在当时青年中所引起的关心却不下于军国大事。其影响也决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辩论所发生者为小。人们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前进和倒退,非正统和正统,革命和保守。^⑥

同样,在《三闲集》中提及自己“杂感家”的“恶溢”时,鲁迅将“杂感”与“私怨”联系在了一起:

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⑦

正如“阜利通”的“评论文风产生的气候条件就是咖啡沙龙之类的文艺群体的兴起”^⑧，“公仇”之所以能够经由“小事情”乃至“私事”进行表达,源于大学及其周边文艺群体的兴起,以及文艺群体的政治化。“后五四”时代,鲁迅写

作杂感,提倡以“小集团”“单身的短兵战”“小周刊”的形式展开“思想革命”,^⑨背后的基础来自尚未被商业和政党收编的出版业。1927年后,随着出版业的繁荣与国民党出版审查的日趋严格,原先的“小周刊”被收编成为商业化的书局,“北新脾气,日见其坏……”^⑩一如小品文从挣扎与战斗逐渐沦为“小摆设”,“杂感”的“私事”与“小事情”也容易在商业出版体制、政治审查中渐变为点缀性的自我表达,丧失了原初的革命性。于是,在编订《二心集》时,鲁迅对喋喋不休于“私事”的知识分子气进行了反思:

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⑪

而这样的转变正源于“社会”“阶级”视野引入后,鲁迅对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念感,“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⑫,所谓“二心”者正来源于此。所以,多年后在与左翼作家的通信中,鲁迅所着力推介的仍是自己的第一部杂文集《二心集》,“还有一本《二心集》,不知道见过没有,这也许比较好一点”^⑬，“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

① Pall Mall Gazette, “The Feuilleton: Its Effect Upon Journalism in France”, *Buffalo Post*, Nov. 03, 1900, p. 7.

②③ [日]上山安敏:《神话与理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孙传钊译,第134、1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④ 鲁迅:《210825 致周作人》,《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09页。

⑤ 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07页。

⑥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4页。

⑦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6页,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

⑧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页。

⑨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5页。

⑩ 鲁迅:《290820 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02页。

⑪⑫ 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95页。

⑬ 鲁迅:《330801 致胡今虚》,《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27页。

比较锋利”^①。鲁迅所言的“比较好”“锋利”恰源于他视野的变化。

从国民革命到阶级革命,与革命目标的变化直接关联着的是文章的战法,鲁迅摒弃了对私事的言说,较之于“杂感”所对应的个人主义的“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②，“杂文”的战斗策略则变成了集体主义的“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③，同时，文章发表的载体也由副刊、周刊变为“左联”或“左倾”媒体所发行的刊物。1933年12月，鲁迅在编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时，将由《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集结而成的《伪自由书》称为“杂感”“短评”：“这一本小书里的，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给《申报》上的《自由谈》的杂感……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④而同期写作的其他文章则编入《南腔北调集》，“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⑤。同时，鲁迅还罗列了刊载这些文章的刊物“《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等”^⑥。此后，因为1934—1935年围绕杂文问题的论战，^⑦鲁迅索性放弃了杂感、杂文的区分，将自己的文集统统都命名为“杂文集”，即便是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亦命名为“杂文”，“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⑧。这显示出一种彻底的反体制、反文坛的能量。

正是在上下对抗中，在不断的挤压中，杂文的位置也日渐清晰。鲁迅不仅声明杂文“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⑨，还强调杂文只要存在就是对大人君子们世界的颠覆，“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为‘文学家’所不屑道”^⑩。杂文是在通过构建另一个文学世界，对抗由政治无意识所构筑的文化道统，“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⑪。也是在上下的对抗意识中，杂文逐渐确立了大众化倾向，与言必及法的政论不同，鲁迅杂文追求的是语言“俗化”，用讥讽灵动的语言风格进行表达。所以，早在编定

《坟》时，鲁迅就一再声明“大概也还能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⑫。此后，他也一再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⑬。不仅是语言，鲁迅杂文从形式到内容、立场都在践行着大众化，曾有人如此形容阅读鲁迅杂文的感受：“在内容方面，自然是代表大众的，是替大众说话的。”^⑭但同时，鲁迅也拒绝成为“大众的新的帮闲”，直接沿用大众的语言，而是使用“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⑮加以改造，使其杂文凝练而具有煽动性，如曾有媒体如此评价《二心集》：“能抒写其个性之发展，在思想文笔上，更能起锋利之设词，然因此而引起当局之注意，视为有煽惑性质。”^⑯但鲁迅的这种杂文实践在催动无产阶级生成“自觉”的同时，也显示了其内在的紧张感：一方面，“杂文”置身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进程中，在不断向下的进程中摒弃了此前的知识分子趣味，力求明白晓畅，使一般文化水平的学生、民众能够接受；而另一方面，鲁迅也意识到杂文在创作的过程中“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⑰，需要启发、引导读者产生阶级的自觉。正是在紧张的关系中，鲁迅杂文实现了阶级意识与文学形式之间的相得益彰，无产阶

① 鲁迅：《350423 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445页。

②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5页。

③ 鲁迅：《351004 致萧军》，《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558页。

④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五卷，第3—4页。

⑤⑥ 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27、428页。

⑦ 参见刘彬《1934—1935：杂文的命名、论战与鲁迅的抉择》，《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⑧⑩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02、431页。

⑨ 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00页。

⑪ 鲁迅：《〈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00页。

⑫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02页。

⑬ 鲁迅：《做文章》，《鲁迅全集》第五卷，第557页。

⑭ 铁新：《〈南腔北调集〉（上）——这非读不可的杂感集！》，《东方快报》1934年6月30日。

⑮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03页。

⑯ 《〈二心集〉被禁》，《东方快报》1934年2月3日。

⑰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67页。

级的意识形态经由杂文实现了对潜在革命主体的询唤,正如孙犁的回忆:“我的战友,大多是青年学生,而且大多是因为爱好文学,尤其是爱好鲁迅的书,走上革命的征途的。”^①

结 语 杂文与 20 世纪中国革命

从创制到成熟,鲁迅杂文在中国革命“向下超越”的过程中如影随形。1980年,在革命画上休止符的时刻,聂绀弩如此回望鲁迅杂文:

鲁迅的杂文,其实已及身而绝了。不错,他发展了中国的杂文,把杂文推向了极致,也正因为如此,也结束了他所扬弃的中国杂文……鲁迅,鲁迅的时代,遭遇,他的敌人和友人都发生了变化,也都因为他,因为他的杂文而发生了变化,他的杂文至少是很难再有了。^②

聂绀弩所注意到的,是鲁迅杂文与 20 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之间的血肉关系,以至于时移世迁后再难复制。可以说,鲁迅杂文的发生过程,不仅仅是特定文学形式的创制,更是对思想以及思想表达形式的探索。在此意义上,鲁迅杂文创造的过程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不断探寻新的表达形式、新的表达内容的缩影。

1915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黄远庸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文学”与政治变革之间根本性的关联,“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③。“新文学”与社会政治根本变革的联系也投射到鲁迅文学的写作过程中,从五四时期的“随感录”到“大革命”时期的杂感,再到左翼文学时代的杂文,一以贯之的是从文学出发介入政治的努力,恰如鲁迅在《文艺与政治

的歧途》中所概括的那样:“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④从国民革命到阶级革命,从杂感到杂文所投射的正是思想、意识、情感的转变:从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达转为革命集体的文化斗争。

在中国革命不断“向下超越”的进程中,鲁迅杂文以灵活的形式进行文化斗争,没有被政治权力、商业资本收编,在充满紧张感的群己关系中,以独特文学表达实现了早年“动吭一呼,闻者兴起”^⑤的文学理想,召唤无数被压迫、挣扎的青年投身于革命。由是,鲁迅杂文不仅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文学形式的创新,也是一代知识分子透过文化革命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缩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历史逻辑与文化内涵研究”(24&ZD193)、“首都师范大学新进教师资助计划”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殷鹏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 ① 孙犁:《关于散文》,《采蒲台的苇——孙犁散文》,第 192 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
- ② 聂绀弩:《序》,《聂绀弩杂文集》,第 2-3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 ③ 黄远庸:《致甲寅杂志记者(其一)》,《甲寅》第 1 卷第 10 号,1914 年 10 月 10 日。
- ④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鲁迅全集》第七卷,第 115 页。
- ⑤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68 页。